

蒋介石大传

刘红 著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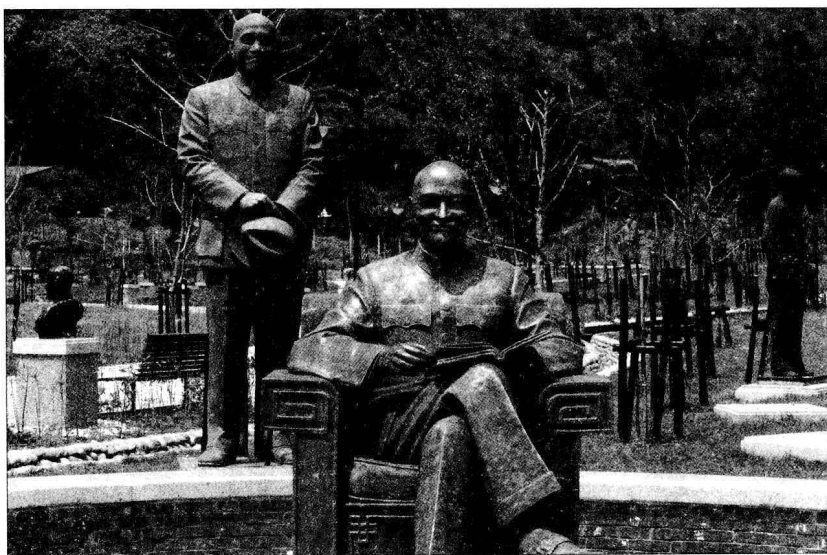


中国华侨出版社

蒋介石大传

(下)

刘红◎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二、艰难抗战中的蒋介石

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战略相持阶段中，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基本未变，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分裂，汪精卫叛国集团公开投降日本，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汉奸；蒋介石的抗日斗志、力度上出现疲软，积极抗日、消极限共转为消极限共，消极抗日，正面战场出现停滞。与此相反，敌后战场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自身也在对日作战中快速发展；同时因为蒋介石限共“反共”意识越来越浓，国共冲突也开始加剧。

（一）持久作战，敌后战场的发展

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由于一方面日军凭借优势兵力、火力疯狂进攻，因此出现了“亡国论”。具有代表性的是汪精卫集团，宣扬“抗日必亡！”“亡国论”再加上国民党军事上的溃退，在相当一部分人中产生共鸣，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由于另一方面是中国军民进行顽强抵抗有效遏制了日寇的进攻势头，日寇又无法占领中国的广大腹地，因此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了“速胜论”。有人认为只要国民党军队认真抗战，只要西方国家出面支持，日寇就可以在短期内打败。因为“速胜论”不符合现实，缺少长期、持久打算，在抗战没有速胜后，“速胜论者”则成为“悲观论者”。

战略相持——抗日战争第二阶段

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完全对立又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如何正确认识抗战形势和抗战前途，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层的一项主要任务。

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一次最高国防会议上就提出了“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的思想，之后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有关机构反复重申过这一思想。在1938年2月间，蒋介石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11月20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指出，第一期战斗表面上我们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是完全成功的。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战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亦就是我们已经依照预定的战略陷敌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1172页）

蒋介石的“持久消耗战”的思想基本符合抗日战争的现实，但是对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作出系统、完整、准确论述的，还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

中共中央对抗日战争有关问题进行过详细的研讨，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艰苦、持久战”的思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都先后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谈话。周恩来还与国民党军事负责人白崇禧等将领对此进行过详细探讨，在白崇禧北上辅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徐州战役时，周恩来还具体对战略和战术提出了看法，曾得到白崇禧的赞赏。在中共领导群体中，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抗战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持久战和抗战三阶段”的光辉思想，丰富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宝库。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一书。在这本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中，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中，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4种矛盾：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弱之间的矛盾；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反侵略，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矛盾；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大小之间的矛盾；日本是失道寡助，中国是得道多助，援助多少之间的矛盾。强弱矛盾决定了抗日战争将成为一场持久战；正义和非正义、大小国家、援助多少的矛盾，决定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结局。在毛泽东之前，国共两党的军事、政治、理论家还没有像毛泽东提得如此全面、透彻、准确。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认为，要想完成赶走日本侵略者的任务，只有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前提。毛泽东针对日本军队的先进武器，对“唯武器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使得多少军事院校毕业的将领们由衷地佩服，使得抗日战争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

提出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具有预见性的指出，抗战的整体战略是持久战。持久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人从外线向中国军队包围、进攻，中国军队则是开展“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中国军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作战方针是运动战，第一阶段是运动战为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二阶段是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第三阶段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深受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赞扬。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理论文章向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介绍后，白崇禧非常生动地把这一思想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12个字，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然后把《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向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进行学习。白崇禧还把《论持久战》发至桂军，要官兵们认真研读，以提高军队士气和素质。当然，蒋介石、白崇禧等人没有想到，贯彻、掌握《论持久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需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国民党推行以限制人民群众为核心的片面抗战路线，无法学到《论持久战》的真谛，更无法在抗战实践中贯彻和实施。

武汉失守后，日寇侵略中国已经陷入无法缓解的危机之中：

一是战线太长，兵力不足。日寇对中国战场估计不足，从战略物资、军事装备到兵役



人员方面，根本没有起码的条件，以为在侵略中国东北时的 17 个师团就足以发动对华战争，实现侵略中国的目的。岂知到 1938 年底已增加到 46 个师团 100 万人，投入中国战场的总兵力已达 24 个师团，已经没有更多的师团调往中国战场，已经没有力量向中国抗日大后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二是开支浩大，军费不足。为对付在华战争的浩大开支，从“七七事变”到 1938 年初，日本政府 4 次追加预算，总数已超过 48 亿元，平均一天费用高达 2000 多万元。其中在淞沪会战的 92 天内，仅陆军弹药消耗就达 106 万吨，军费开支达 21 亿日元。日军之所以在占领南京后延误半年多才开始向武汉发动进攻，因素很多，但需要补充军备物资是重要原因。所以在进攻武汉时，日军一门野炮只有 200 发炮弹，一门榴弹炮只有 120 发炮弹，一门山炮只有 150 发炮弹。如果正常作战，炮弹只能维持 2 至 3 个小时。

三是经济困难，矛盾尖锐。巨额的军费负担引起日本本土的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在加紧掠夺中国、朝鲜，以战养战的同时，颁布了《国家总动员令》和其他很多战时统制法，通过加紧向民众灌输法西斯武士道精神、维持战时体制，干预和指挥经济，规定工人每天劳动时间可以增加至 12~14 个小时，增加对工人的剥削，以弥补军事需要的不足。此外，为确保军火工业的优先发展，许多民用工业被压制，国内民用物资奇缺，造成物价飞涨，社会矛盾激化。

四是中国人民的反抗。日军侵略中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正面战场虽然连遭失败，但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不得不让日寇正视中国人民的力量。此外国民党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抗战，在军队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日军是无法彻底消灭的。再则，敌后战场开辟后，游击战争在所有的日寇占领区蓬勃展开，严重威胁日军的存在，日军只能孤立地据守交通要道和一些城镇，时刻处于人民抗日武装的包围之中，日军的交通线、经济热点、统治秩序、军事力量和军政据点都处于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战士的打击之下。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宣告了日本速战速决占领中国阴谋的破产。日本因为侵略实力不够，对华方针开始改变。第一阶段是把主要兵力用在正面战场，对南京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第二阶段是把主要兵力用在敌后战场，对南京政府是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在继续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开始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拉拢，实施政治诱降方针。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蒋介石集团开始由积极抗日、消极限共转为消极抗日、积极限共，正面战场出现停滞，“反共”军事冲突加剧；汪精卫集团则公开投降卖国。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寇改变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变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在正面战场的武汉周边地区进行了以连接北南两个战场为目的有限的作战以外，主要是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维持对占领区的统治，从正面战场抽出相当多的兵力对付敌后根据地。因此，从抗战第二阶段起，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抗日前沿——敌后战场挺立敌后

敌后战场建立后，在严酷的对日作战中迅速发展。仅在华北地区，日军保持的兵力高达 44 万人，是向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作战时的 3~4 倍。在抗战第二、三年中，日寇对华北各根据地动用兵力 1000 人以上的“扫荡”达 109 次，动用兵力万人以上的大“扫荡”有 7 次，最大的一次日寇动用兵力达 6 万人。为了封锁华北的各根据地，日军在根据地四



周修筑了1870千米的铁路、15600千米的公路、2749个据点，在华北平原上可谓是“抬头见炮楼，抬腿过壕沟”。从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间，对日作战，八路军大小作战15139次，新四军作战4967次，平均每天27次，消灭敌人18万余人，其中日军高达10余万人，俘虏日军1400人，日军投诚31人。其中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中，贺龙的120师，消灭日伪1500余人，树立了平原歼敌的榜样；1939年11月上旬的黄土岭战斗中，晋察冀八路军杨成武部击毙敌旅团长、“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八路军以自己的抗日业绩，名震天下。

同时，华北和东南抗日根据地从抗战第二阶段起，也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主要进攻地区。本来华北四大根据地范围内的国民党军队早已撤走，根据地建立后，在边缘地区也有不少国民党军队前来借光。随着抗日形势的改变，这些国民党军队也反客为主，向八路军发动进攻，被八路军一一击溃。正是在集中精力对日作战的同时，展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自卫反击战，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根据地在巩固中扩大。

晋察冀根据地。到1940年底，根据地已经发展到东至渤海，西至同蒲路，南至正太路，北至张家口、多伦、锦州一线，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的一部分，面积达80万平方千米，人口达2500万人。晋察冀边区，等于是插入日寇华北占领区中心（北）平（天）津保（定）地区的一把尖刀。晋察冀八路军发展到10万余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是聂荣臻任司令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编有（司令兼政委）杨成武1分区，郭天民（司令）、赵尔陆（政委）的2分区，黄永胜、王平的3分区，熊伯涛、刘道生的4分区；萧克、程世才的挺进军；吕正操、程子华的3纵队（兼冀中军区）。

晋绥根据地。由于晋绥根据地处于内蒙古、山西、陕西交界处，东起同蒲路、平绥路，西至黄河，南迄汾阳、离石一线，北到绥远包头、百灵庙一线，面积33万平方千米，人口320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日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前沿阵地，因而成为日寇进攻的重点。仅在1940年就发动3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为八路军一一击退。同年2月，晋绥根据地还成立了包括大青山和晋西北根据地在内的抗日民主政府。晋绥根据地八路军最高领导机关是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的120师，全师有近4万人。编有张宗逊、李井泉的358旅，王震的359旅，高士一、朱辉照的独1旅，彭绍辉、张平化独2旅，姚哲、张达志的骑兵支队，续范亭、罗贵波的新军。

晋冀鲁豫根据地。横跨四省、位于中原腹地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一直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1938年底，日军集中3万兵力，从平汉路和陇海路进行夹击；1939年秋又出动13万兵力分9路进行围攻。1940年全区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对日作战1410次，破坏敌方控制的铁路、公路6000余千米。根据地东临津浦线，西至汾河，北接沧州、石家庄，南靠黄河、陇海路，面积达69万平方千米，人口为2500万。晋冀鲁豫不仅面积大，军队也发展到11万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编有陈锡联、谢富治的385旅，陈赓、王新亭的386旅；还有新1、4、7、8、10旅，决死1、3纵；杨得志、苏振华的2纵；陈再道、宋任穷的冀南军区，秦基伟、高杨的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

山东根据地。1939年3月间，罗荣桓率领115师一部到达鲁西南后，与山东地方游击队联合起来，在郛城樊坝消灭伪军一个团，主力继续东进泰山以西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5月间打破日伪军5000余人的“围剿”，站稳脚跟。到1940年间，已经发展到鲁冀苏各一部分，面积为60万平方千米，人口2900万人。山东解放区成为华北、华中两大战



略区的连接地，它的建立，为东南沿海地区新四军各部前往华北各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安全通道，作战效率和政治影响大为扩大。山东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山东军区，有八路军5万余人，主力部队有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编有曾国华、吴文玉的教导第2旅，邓克明、张国华的教4旅，邢仁甫、同贯玉的教6旅；主力部队有张经武、黎玉的1纵，编有王建安、周赤萍的1旅，孙继光、王宏坤的2旅，许世友、刘其人的3旅，廖容标、江华的4旅，吴克华、高锦纯的5旅；还有第1、5支队和独立支队。

新四军的对日作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则复杂得多。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主要是除了要考虑对日作战以外，还要对付国民党势力的干扰。这一地区是有特定的背景：首先，靠近宁沪杭地区，在抗战以前就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四大家族的主要势力范围，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要比华北根据地所在的地区强得多。其次，国民党为避免华北大撤退中敌后地区被中共占领的事情发生，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失利后，在苏皖浙赣交界处特别是在皖南地区留下了10多万的正规军。再次，国民党留下了一批土匪性武装，如戴笠和杜月笙于1937年10月成立的“江浙行动委员会”，后又成立“淞沪别动总队司令部”，退出上海后易名为“忠义救国军”，主要任务就是“反共”，在敌后游击区和新四军作战。中共中央一再指示东南局书记项英，发展新四军，建立根据地，项英一直没有启动的主要考虑就是这些，因而失去了许多有利时机，直到最后酿成了“皖南事变”。

新四军茅山根据地建立后，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应该沿茅山东进，同时北进江北，项英没有行动，3支主力支队还留在当地。1939年二三月间，中央派周恩来来到新四军岩寺总部，向项英重申了中央“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精神。1939年4月，陈毅、谭震林派了第3支队叶飞的第6团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上海近郊及苏锡常一线，震动了日寇最高当局。11月间，因为新四军总部在皖南的寿县岩寺地区，远离抗日前线，为了便于指挥江南地区的抗日战争，第1、2支队合组成“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总指挥，粟裕任副总指挥，包括陈毅的第1支队、张鼎丞的第2支队、以镇江地区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管文蔚指挥的挺进纵队、叶飞的江南纵队。

江南指挥部建立后，以第2支队的陶勇部改编为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在泰兴、六合、仪征附近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渡江北上的还有管文蔚挺进支队，面对有利形势，中央军委指示张云逸的第三支队立即全部北上，项英只让张云逸率领两个连北上。不久，高敬亭第4支队的方毅第8团也开到津浦路东地区。

新四军的问题不仅是项英的问题，还有第4支队高敬亭不服从命令的问题。高敬亭参加红军较早，抗战开始后，新四军只有10000余人，但第4支队有4000人，所以高敬亭认为应该由他来领导新四军，对总部要4支队东进的指示一直不理不睬，在总部的一再催促下，实在没有办法，只派出方毅团东进。并且第4支队也存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问题。到1939年4月间，中共中央认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派出叶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出面处理，同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也出面找高敬亭谈话。6月间，新四军内开展“反高斗争”。

反高斗争中，叶挺宣布组成“江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张劲夫任副主任。编有张云逸的第3支队；原第4支队改编而来的第4、5支队，分别由徐海东、罗炳辉将军作司令员；李先念的鄂豫



游击纵队；彭雪枫的第6支队。

其中鄂豫纵队，最早是陶铸、杨学诚带着8条枪到鄂中开始的；李先念则带着一个连到河南新阳地区开始游击战争，两支部队合并为鄂皖游击纵队。这支部队活动区域北起信阳，西至汉水，东接安徽，南到洞庭，形成对武汉的包围。鄂皖解放区独立于中原，和其他根据地没法联系，控制着平汉路两侧。日寇为解除这一对武汉和平汉路的严重威胁，多次重兵进行大“扫荡”。鄂皖根据地的对日作战非常艰苦，仅1939~1941年间，对日作战1030次，消灭日伪41100人。鄂豫纵队（后改为新四军第5师）牺牲的连级以上干部就有110余人，地方区级以上干部达180人。

第6支队则是1938年10月组建，于1939年春挺进徐州地区，随后又到蚌埠一带活动，7月张爱萍部前来配合，创建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第4支队则继续在路西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第5支队则开往皖东半塔集地区建立根据地。

至此，新四军的苏北、苏中、苏南、皖东、皖北、皖中、豫鄂以及浙东等根据地正式建立起来。总面积达120万平方千米，人口6000余万。

从东北到华北、东南、华南，直至海南岛，在日寇占领区，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群众，建立起一座座抗日的堡垒，组织起无数个抗日战场，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向日本侵略者发动袭击和进攻。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游击队的频繁打击下，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所有侵华日军都处于忧虑烦躁、胆战心惊之中，从城市到乡村，日军没有安全的场所，据点不安宁，交通线不畅通，通讯被毁坏，日军每时每刻在消耗。日军这架战争机器，每个部位和每个零件都被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损坏，战争机器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整体战斗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虽说八路军、新四军没有连续组织正面战场上的正规会战，但所起的作用也不亚于正面战场的作战，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的作战，日寇不会在武汉会战后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不会在8年间就被打败。

八路军、新四军也正是在对日作战中，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迅速发展起来，到1941年5月间，八路军、新四军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民兵发展到200多万人，中共成员也增加到80万人，解放区人口达到9000多万人。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军队建立的抗日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外，都是在日寇占领区，根本不存在“一分抗日二分游击七分发展”问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公忠体国，尽了应尽的义务，做了应做的工作。

百团大战——人民军队痛击日寇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开始把主要兵力转向敌后战场，作战目标是清理敌后战场，稳定占领区秩序，保证交通线的畅通，建立有利于日寇掠夺战争资源、维持统治的安全机制。因此，调集大批主力对各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

1939年10月，战犯多田骏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认为八路军已经成为日本征服华北的主要障碍，开始把八路军作为日军的主要作战对象，调集兵力对华北占领区实施囚笼战略，通过封锁沟、交通线、碉堡阵、反复“扫荡”、三光政策把华北根据地分割、包围，不少根据地又变成游击区。因此打破日寇的囚笼政策，已成为八路军的主要作战任务。

在华北地区，横贯着平汉、津浦、正太、同蒲、白（壁）晋（城）五条铁路，成为分割华北四大根据地的主要封锁线。其中白晋铁路正好由西北到东南斜穿晋冀鲁豫根据地



而过；正太路，横亘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之间，实为八路军在华北发展根据地、打击日寇的心腹之患。对于白晋铁路，129师已于1940年夏，在全长200多千米的铁路线上全线出击，破坏铁路50多千米，毁坏桥梁50多座，导致整条铁路线运输中断，使得日寇切断太行和冀南两块根据地的计划没有实现。

1940年春，在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基本胜利后，第18集团军总指挥部已经开始考虑进行反囚笼作战。因为朱德总司令要在4月间前往洛阳和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所以在行前与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决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破袭战，打破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封锁。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准备，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发布了《关于正太路战役的命令》，同日上报中央军委。8月8日，三位将军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规定各路大军于8月20日开始投入作战。现代史上闻名的“百团大战”打响了。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舒同，决定将全军区50个团大部，分成左中右3路主攻纵队和独立支队，分别在娘子关至上下安段铁路、娘子关至平定段铁路等采取破袭战和钳制平汉路西的日军。所属的吕正操、程子华指挥的冀中军区分别参加正太路战区和牵制平汉路东日军的作战。晋冀鲁豫根据地的129师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决定成立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组成前线指挥部，将全军60个团中的大部，也分成中央和左右3个纵队，分别对正太铁路平定至榆次段，平汉路上的元氏至安阳段和德州至石家庄段、同蒲铁路榆次至临汾段，白晋铁路平遥至壶关段以及临汾至屯留公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晋西北的120师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领到的作战任务是破坏平遥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因此决定所部33个团大部出击，攻占岚县至离石一线的日军据点，破坏汾离公路，破坏高村至平社段同蒲铁路，进攻五寨、神池一线的交通线。同时派出两个正规团南下归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参加晋冀鲁豫区的作战。

8月20日晚8时，百团大战正式开始，各路纵队如猛虎下山，同时出击，正太路、同蒲路、平汉路段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目标到9月10日全部实现，使华北日寇交通线几乎全部瘫痪。第二阶段从9月20日开始到10月初结束，主要任务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仅晋察冀军区军民在涞源、灵丘间就拔除据点29个。第三阶段从10月6日起到12月5日结束，主要任务是反“扫荡”，华北日军面对八路军的全面进攻，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英勇的反“扫荡”，打退了日寇的进攻。

百团大战为时3个半月，参战部队是正太线上30个团，平汉线是15个团，同蒲线上12个团，津浦线上4个团，加上其他战线上的部队，总共为105个团。期间共战斗1824次，击毙击伤日伪军25800多人，攻克日伪军据点2911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千米、公路1500余千米和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建筑物260余处，缴获步枪5400余支、机枪200多挺、各种炮53门，炸毁敌机6架，战果辉煌，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一在抗日战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战役，历史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由八路军100多个团奋勇拼杀进行的百团大战，历史功绩将永存史册。

第一，百团大战的发动是适时的。当时，欧洲波兰战争爆发后，国际法西斯分外嚣张，对日本是一大刺激，在加紧对蒋介石劝降的同时，急于打通浙赣线和平汉线，为发



动太平洋战争做准备。因此，抗战已经进入空前困难阶段，投降是当时主要的危险。在这一抗战的紧要关头，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应该站出来，拨正抗战的航向。百团大战的进行，有利于稳定全民抗战的局面，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制止蒋介石的投降危险。从总体上看，百团大战对战局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二，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战果辉煌，有效杀伤了日伪的有生力量，破坏了日寇的战争机制，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战后不久，任职时间不长的多田骏中将被撤职，说明百团大战打痛了日寇。

第三，彻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争取到中间势力，提高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威望。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和重要人士向中共领袖们发来了大量贺电贺信，全国各大报都在显要位置登载了百团大战各战役的消息，国际各主要通讯社纷纷发表电讯稿，引起了西方主要国家对中国战场、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度关注。百团大战的战绩，是中共宣传抗战、反击“反共”高潮的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正如毛泽东也在贺电中说：“蒋介石正在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就要用百团大战这种形式去反击它。”

第四，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日胜利的信心。日寇占领南昌、襄阳、南宁、宜昌等地，以及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并且不时传出蒋介石和日本当局秘密会谈的消息，使得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国民党军队中上层军官中出现了一些失败论调，在国统区和敌占区的部分民众和舆论机构中也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对抗战前途有所担心。中共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日情绪。因此，百团大战对扭转抗战二阶段以来的僵持局面有重大意义。

（二）战略相持，正面战场的停滞

敌后、正面两个战场的作战，有效地遏制了日寇的进攻势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抗战进入新的艰苦历程。由于日本已经失去继续扩大占领区的能力，正面战场的压力相对稳定，蒋介石继续采取消极防御策略，使得正面战场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

投降卖国——汪精卫演出最后一幕

西方国家对日妥协 卢沟桥事变起，蒋介石曾寄希望于外交渠道解决日本侵华问题，中国政府外交部于7月10日、13日、19日三次要求日本停止战争挑衅，均遭到日方拒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源）灵（丘）战役中，全歼日军170多人。图为八路军将士在长城古堡上欢呼胜利（沙飞摄）。



绝。蒋介石通过日本纺织同业会理事长、曾任上海总领事的船津辰一郎与日方谈判。船津辰根据日本当局的旨意于8月7日到达上海，与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一起，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会谈。只因淞沪抗战爆发，秘密会谈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蒋介石寄希望于西方大国对日本采取行动，以制止日本扩大战争的行为。蒋介石频繁与英国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法国大使那齐雅、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要求他们与日本斡旋，按照国际法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但是他们关心的只是在华侨民的安全和利益，只是希望日本方面能够自我节制。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再次希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反侵略予以同情，以履行各国在国际条约下应尽的义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在西方国家没有明确表态前，蒋介石指示中国代表团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并递交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说明书。令人遗憾的是，10月6日国联开会时，只是请美国通过九国公约组织负责处理。24日，九国公约组织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中国政府指示中国代表顾维钧、郭泰祺、钱泰如，向会议提出要求与会国出面调停，尽早结束战争。会议只是轻描淡写地要求日本代表来会议“作出说明和交换意见”，如此明显偏袒侵略的要求也被日本方面所拒绝。会议还无理要求中国代表退席，更不用说进行有利于调停的任何努力。11月24日，会议以“会议认为，暂时休会是可取的”为理由，决定休会。

九国公约组织布鲁塞尔会议出现如此结果，反映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不良用心。日本在制定侵华方案时，占领中国是为了北进和南进。北进是进攻苏联，南进是进攻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但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是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因此他们的企图是纵容日本实施北进，同时把中国让给日本，阻止其南下。

英国是有名的老奸巨猾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待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上，是损人利己，出让中国利益。他们看来，日本实力有限，根本无法独占中国，因此承认日本在华攫取的利益，既能阻止日本南下；另一方面，承认日本在华利益，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取得彻底解放，也不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认为，也不完全放弃蒋介石，因为需要蒋介石制衡日本和中共。已经强大起来的美国也是这样，他们在中国抗战开始后，向南京政府提供了为数不大的援助，但是以不惹怒日本人为限度。1937年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中立法声明”，武器、弹药和军用材料同时向中日双方提供，在侵略和被侵略面前，美国保持“中立”，实则是对侵略者的纵容。由于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得到美国同意后向美国购买了大量的钢材、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弥补了日本侵华战争物资的不足。

在南京失守进行的陶德曼调停失败后，中国政府于1938年1月25日指示顾维钧代表再度争取国联的支持。顾维钧、郭泰祺等人在向西方大国提出制裁日本侵略行动、援助中国抗战的要求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对日禁运未见得有效，关键还是要美国同意；至于对华援助，则应由与中国邻近的苏联进行。法国外交部部长德尔博斯提出，应由有关各国与美国协商，如果认为时机成熟，再召开九国公约组织会议，以讨论对日制裁问题。英法如果单方面对日制裁，日本会作出强硬反应，也不利于欧洲局势的演变。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则表示，苏联认为对日制裁不会奏效，中国不应该提制裁日本提案。苏联有关方面甚至认为，日本在中国扩大战争，有可能推迟欧洲战争的爆发。

英、法、苏等国再次把球踢给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利明确向中国驻美国大使王正廷表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结束不久，再次召开不见得有何助益；再则美国人民和美



国国会因为经济利益和其他因素，不见得同意对日制裁；如果美国同意制裁日本，等于把美国拖入远东战争之中。1月27日，国联理事会召开第100次会议，顾维钧在会上重申了对国联的信任，希望各成员国力行国联章程，制止侵略。中国代表的要求没有得到与会国的赞成，国联只是在2月2日，通过了表面上不赞成日本在华的军事行动，实际上袒护侵略的决议。5月间，国联理事会召开第101次会议，除苏联代表李维诺夫表示全面支持中国的申诉外，西方国家态度依旧。1938年9月，武汉会战接近失败之际，在国联第19届全体会议和理事会议期间，中国政府和代表团坚决主张按照国联盟约第17条，对日采取全面禁运和制裁措施。西方国家在口头上表示对中国的同情外，对中国要求制裁日本的行动，冷嘲热讽，无视国际正义，要求中国收回提案。中国政府反对侵略的申诉，直到欧洲、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武汉会战以后，西方英美等国袒护侵略的行为进一步发展，他们多次和蒋介石密谈，劝导中国政府与日本停战议和。同时策划太平洋国际会议，压中国和日本议和。与英法等国纵容德国在东欧的侵略，在捷克不在场的情况下，同意捷克苏台德地区割让德国，以把祸水引向苏联被称为“慕尼黑阴谋”一样，西方国家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袒护侵略、歧视中国的行为也被称为“远东慕尼黑”。这一阴谋之所以最后没有成功，是因为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布鲁塞尔会议夭折和国联无视正义、袒护侵略，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华盛顿体系的破产，同时助长了国际法西斯势力，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在远东地区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

在向国联、九国公约组织申诉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几个月间，与日本进行谈判，谋求停战。

陶德曼调停 10月23日，日本当局担心第二天开幕的布鲁塞尔会议得出不利于日本方面的结论，为了向会议施加压力，宣布接受已经参加德日“‘反共’协定”的意大利和德国的调停。

德国和意大利都同意其驻中国大使出面调停，其中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具体参与其事。日本参谋本部马奈木敬信中佐通过德国驻日本武官奥特来到上海，与陶德曼商谈。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汪精卫。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开始向南京进攻，11月28、29日两天，即将出任行政院院长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紧急通知陶德曼，表示中国准备与日本议和。蒋介石也于在南京沦陷前夕，即12月2日在南京约见陶德曼。26日，陶德曼与孔祥熙和宋美龄会谈。在1938年1月上旬，陶德曼继续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进行过多次会议。

在陶德曼和中国政府方面的会谈中，只是转告日本方面的侵略要求而已。如11月5日，转告的日方条件是，在内蒙古成立自治政府，华北“非武装区”扩大到冀中地区，上海停战区扩大，停止排日，减低日货关税，共同防共。蒋介石也认为如果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即要垮台。日本方面是要扩大侵略行动。当蒋介石在南京沦陷前夕向陶德曼表示，愿意11月5日的谈话为基础与日本进行谈判。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不但不接受，反而加以嘲笑一番，狂妄声称在日军已取得巨大军事胜利之后再重谈1个月以前提出的条件有何意义？日本当局在占领南京后，于12月22日通过德国方面向中国方面提出，中国与日、“满”合作实行“反共”政策和缔结秘密经济协定，中国赔偿日本的损失等无理要求。并且把12月31日是中国接受日本条件的最后期限。日本的条件，也就是要中国投



降。对此，蒋介石在当天（26日）的日记中记道：“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声称：“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期待真是与日本提携的新兴支那政权之成立与发展。俾与之调整两国邦交，以协助建立更生之新支那。”（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之十一第106页）18日，重庆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尽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潜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107页）

1月20日，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离开日本。8天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宣布离任。因此，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抵抗侵略但没有对日本宣战的情况下，中国和日本两国断交！陶德曼调停因此而宣告结束！

中日秘密谈判 中日两国断交前后，蒋介石还在谋取与日本当局的联络。如果说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之初，与日本当局进行政治接触、外交谈判，希望通过和平渠道解决日本扩大战争问题还有可行性的，还可以理解的话，在日本占领中国首都、两国断交后，蒋介石还在继续进行谈判，显然是灭中国人之威风，长侵略者之志气。

在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后，蒋介石派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秘密前往已被日寇占领的上海。高宗武在上海期间，与日本近卫首相关系亲密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局局长松本重治多次密谈。董道宁和正在上海的川越茂进行会见，并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日本陆军大将西义一的亲戚西义显拉上关系。通过西义显的安排，董道宁于2月中旬由日本军部安排前往日本，在日本期间与日本军部许多高级将领、特务头目进行了密谈。3月16日，高宗武、董道宁与松本重治、西义显在上海见面后，27日又在香港进行7小时密谈。月底，高宗武、董道宁回到武汉向蒋介石汇报后，4月16日在高宗武、董道宁再到香港向日方代表谈判，日方已经没有兴趣。1938年5月日本内阁改组，主张保持日本既有在华利益、尽快结束在华战争的宇垣一成出任外交大臣。蒋介石以为谈判时机成熟，又派出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秘书乔辅山，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平一进行谈判。由于日本不仅没有退让，并且开始部署全面进攻武汉、广州，蒋介石再次被日本方面戏弄一把，求和愿望破灭，只得放弃三心二意、侥幸心理，开始认真布置大武汉保卫战的整体防务计划。

中日秘密谈判的主要内容，一是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是否不再与中国进行谈判？日方不仅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反抗，而且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还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了两封亲笔信，要两人勇敢地站出来，与日本谋和。二是“议和条件”，蒋介石认为日本态度积极，表示愿意与日本“以诚相见”，同意“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侵略所占中国领土的合法化，出让中国的东北和热河主权、领土的方式，与日本谋和。对此，无法满足日寇的侵略胃口。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政府应和日本扶持的伪政权合并，停止抗日容共政策，蒋介石必须“下野”。在蒋介石没有同意此条件前，日本不与蒋介石谈判“停战问题”。对于这样苛刻、实质上是要蒋介石投降的条件，蒋介石竟然同意要乔辅山继续争取，讨价还价，最后没有结果。三是在3月27日，高宗武、董道宁在香港与日本方面表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集团有志于“和平运动”，这也使得日本当局已经把谈判的重点转向汪精



卫，准备扶助汪精卫上台充当傀儡。

对于蒋介石希望国联出面制止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和与日本和谈一事，应该客观地分析。在两国发生战争之时，争取利用外交途径予以解决，避免更大的损失，作为统治者来说应该是理智的行为。问题是蒋介石的和谈也好，争取国联援助也好，有几个失误：一是过高地估计了西方国家的正义感，二是不吸取“九一八事变”时被国联伤害的教训，三是继续抱有对日本的幻想，四是无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愿望，所以蒋介石一直不放弃对日谈判。

当然蒋介石在以上失误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失误，那就是谈判的目的和原则上的失误。他的对日谈判的底线，既非逼日寇退出中国，也不是要日寇进行战争赔偿，只是要日寇停止扩大战争，承认日本对已经占领地区的控制。如此谈判，当然不可能遏制军事上一再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这一基础上，日本对与蒋介石谈判的底线非常明确，那就是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压蒋介石投降，以花费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蒋介石不会接受日本的这一底线。因此，这场谈判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

评价一场政治谈判最主要的标准是看谈判的结果，蒋介石和日本方面的谈判，并没有签订卖国条约，也没有放弃抗日决策和行动，这是考察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和日本方面谈判的基本点。不能因为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进行过谈判，就把这说成是蒋介石破坏抗日的举动，甚至说成是蒋介石的卖国举动，这就有违基本史实。只能说是蒋介石出于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基于错误立场，错误地与日本进行了一场错误的谈判，不仅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而且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

汪精卫当汉奸 汪精卫的叛国，正是他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恶性发展，是他长期以来媚日“反共”的必然结果。汪精卫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不具备当领袖的品德和才华，却一直想当领袖。如果说汪精卫以前的政治投机，都是以国民党派系内斗、个人权力之争为背景，那么此次进行的政治投机，以投降日本作为本钱换取伪政府最高领袖的地位，这场赌博则是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相对抗，是非常危险的政治游戏，等着他的只能是一条不归路。



汪精卫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

国民党“五大”后，中国对日立场和态度趋于强硬。但在南京西流湾8号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周佛海家中，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原江苏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梅思平，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国民党中央监委兼中央党部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委褚民谊等人经常举行闲聊式集会，胡适、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等人时常光顾。对日态度是会议的基本主题，认为“抗日必亡”，蒋介石宣传抗战是唱高调；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上当受骗，只有联日“反共”才是唯一出路。汪精卫等人称之为“救国俱乐部”，胡适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进步人士和舆论则称之为“投降俱乐部”。显然，“低调俱乐



部”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

1938年1月14日，“低调俱乐部”成员还在武汉创办“文艺研究会”，由汪精卫出任指导，周佛海、陶希圣出任总务、研究总干事。文艺研究会还在长沙、广州、重庆、西安、香港等设有分会。从中可以看出“低调俱乐部”在当时还有相当的市场。

全面抗战开始后，平津沦陷之时，忘了体内还有因为宣扬降日言论、带来的两颗子弹没有取出的汪精卫，发表了《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宣扬日本一步一步杀进来，中国只有一步一步后退，因为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绝对阻碍不了日本的对华侵略，中国只能是“确实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仍然让下去”，只能想使日本进行慢些，我们退得慢些。《最后关头》缺少中国人应有的骨气。在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的开幕式上，汪精卫声称，“一切武装同胞与非武装同胞的血，从前流着，现在流着，未来还要流着”。对汪精卫来说，抗日无非是多流血，毫无前途可言。汪精卫开始寻找一条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的“救国之路”。汪精卫确实认为中国人民根本没有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可能，日本占领中国将成为永远的事实，中国只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对日晚降不如早降，与其跟着蒋介石走一条只能失败的抗战路，还不如走一条投降路，既能满足日本人的要求，又能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与蒋介石一争高低。

陶德曼开始调停后，10月31日汪精卫急忙与陶德曼见面。两人交谈后，汪精卫成为中日和谈的积极主导者，极力劝说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甚至出面逼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下令宣布接受日本全部条件。孔祥熙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大，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

陶德曼调停失败，日本当局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实质上也是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人见时机到来，高度关注日本当局关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权”的意向。

1938年2月，汪精卫和周佛海在汉口设立“日本问题研究会”，主任即为正在为蒋介石奔走、谋求与日本谈判之路的高宗武。日研会名为搜集日本情报，实为寻找新的卖国途径。因此，高宗武、董道宁与日本方面的谈判，既完成蒋介石交代的与日谈判的任务，也有为汪精卫卖国计划联络的性质。

除此之外，华北和南京两个伪政府的成立也刺激了汪精卫的政治野心。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日寇认为出台的汉奸分量不够，所以让这个不伦不类的伪政府的“政府主席”职虚空。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是梁鸿志。一南一北两个汉奸政权出场，使得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也使得汪精卫加快了卖国部署，以免落后于其他败类，“统一组阁”任务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开始实施卖国计划的具体行动。

7月5日，汪精卫秘密派遣高宗武作为代表前往日本，会见了日本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总长多田骏、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日本方面向高宗武明确提出，对华方针的重点是政治诱降，只要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人愿意出山组织政府，日本方面将全力支持。这是日本方面向汪精卫发出的具体信息。蒋介石得知高宗武去日本的消息后，破口大骂：“高宗武这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今井武夫回忆录》第79页）8月底高宗武因为肺结核复发，由梅思平在香港等地与日方继续会谈，具体谈到了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来领导“和平运动”的设想。

武汉失守后，汪精卫投降步伐加快。11月12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今井武



夫、伊藤芳男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的重光堂秘密会谈，会谈的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确定汪精卫投敌出任傀儡政府首脑、安排汪精卫出逃。会议中，梅思平、高宗平异想天开，以为日本真是把已经占领的中国领土交给汪精卫管理，因此提出日军从内蒙古和华北、东南、华中、华南地区分阶段分梯队撤出，被日方完全拒绝。对于汪精卫出逃，会议决定一条是由重庆直飞香港；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只是前者比较危险，因为汪精卫目标太大，容易暴露，后者相对安全，只要过云南龙云一关即可。11月20日晚，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纪录》、《日华协议纪录应谅解事项》和《日华秘密协议纪录》三个文件。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三个协议，确定了“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个基本原则，在占领中国领土的前提下，宣扬两国合作，掩盖侵略真相。三个“原则”，不仅是要日本侵略中国长期化、合法化，也是在为汪精卫的卖国行动制造理论依据。

12月7日，为落实汪精卫逃跑路线，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佛海借视察宣传为名去了昆明，中央大学教授陶希圣随行。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让远房侄子陈春圃把她的儿子汪文梯和幼女汪文恂先送昆明。

12月3日，日本见汪精卫投降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由近卫首相出面发表了“中日冲突有解决之望，只需蒋介石将军向国民政府辞职，参加行将成立之新中央政府”的声明（见《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第175页）正在桂林的蒋介石收到后，担心政局有变，马上派陈布雷先行回重庆，稳住汪精卫等上层人物。8日蒋介石飞回重庆黄山官邸，次日召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傖到官邸开会，讨论抗日大计。

12月9日，本是汪精卫预定赴昆明出逃的日子。岂知蒋介石在12月8日突然从外地来到重庆，并且立即致电昆明的周佛海回重庆召集上层会议，打乱了汪精卫的出逃计划。

在12月9日的会议上，蒋介石认为，中国抗战的前途光明，中国军队已按照预定计划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有利于中国。蒋介石是有感而为，说明他已不准寄希望于与日本的谈判。汪精卫声称：“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两者皆有困难，故和平非可无望。（《陈布雷回忆录》第89页）他还认为，应该响应日本的“和平运动”，与日本共同防共和建设“东亚新秩序”。

汪精卫不得不推迟叛逃日期，并且装出种种关心国事的姿态来，参加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听取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军统局长戴笠、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的工作汇报，实质是旁敲侧击摸蒋介石的底。12月16日，汪精卫求见蒋介石。在与病中的蒋介石进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会面，见面时声称“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要蒋介石不要从个人毁誉和难易考虑，应该因“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而迅速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严正拒绝了汪精卫的要挟，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此次“最后的谈话”（《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01页）。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以应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陈公博邀请到成都发表演讲为名，通过原改组派骨干、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办妥机票，与夫人陈璧君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曾仲鸣等人一起飞昆明。同一架飞机上，竟然坐着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周司令见国民党副总裁乘坐同一架飞机，还亲自表演了一番驾驶技术。周至柔的出现，使得汪精卫非常紧张，汪精卫以为是蒋介石得知底细后派来监视他的。在昆明期间，汪精卫劝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通电响应“和平运动”，但被两将军拒绝。汪精卫



见事情败露，以防不测，遂于次日晚和周佛海等人乘火车离开春城，前往法国殖民地越南河内。27日，汪精卫的多年助手陈公博和陶希圣赶往河内会合。

见汪精卫逃出中国，原定于在汪精卫12月9日逃离重庆后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日本首相近卫，于22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日本将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声明基本肯定了“重光堂协议”的内容，只是把日本撤军问题全部取消（《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文书卷第407页）。汪精卫11日致电蒋介石，2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最高国防会议，声称：近卫第三次声明“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6编之三第48页、《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第5页）29日，汪精卫另一追随者林柏生控制的《南华早报》刊登了臭名昭著的降日电报韵目代号为“艳”的电文。“艳电”成为汪精卫投降卖国的宣言书和自供状，标志着汪精卫已经完全投入侵略者的怀抱，卖国求荣，成为一代卖国巨奸，千古罪人。

对于汪精卫叛国一事，蒋介石非常重视，为阻止事态发展和影响抗日情绪，他下令封锁汪精卫出走的真相和消息，说汪精卫因为旧病复发，在昆明无法回渝。24日他从陕西武功回到重庆后，立即通过端纳通知英、美使馆，表示汪精卫无权代表任何人进行谈判，中国不准备与日本讲和，已经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表示，汪精卫出走是个人行为，毫无政治意味。事实上蒋介石事发之初也摸不清汪精卫的底细，因为凭他多年和汪精卫的来往，认为汪精卫虽然权欲熏心，但不会不知道叛国的分量，不会走上叛国之路。

蒋介石为挽救汪精卫作过一些努力。12月27日，致电住在越南河内高朗街27号的汪精卫，恳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迅速回渝报到。开除汪精卫党籍后，蒋介石又让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出面，劝汪精卫回国参加抗战。为教训汪精卫，劝汪精卫悬崖勒马，军统局特务在香港暗杀刊登“艳电”的《南华早报》后台林柏生，遗憾的是林柏生被铁棍击中头部后并没有死亡。1939年1月30日，蒋介石派出中央执行委员、昔日改组派干将谷正鼎带着签好的护照，赶到河内，劝说汪精卫出国游历。

《艳电》发表后，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和海外华侨，形成了一股声讨的怒潮。延安也举行了讨汪大会，强烈谴责投降派的卖国行为。中共将领和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纷纷发表通电，要求严惩叛国贼。在全国皆曰“卖国贼可杀”的压力下，蒋介石只能于1939年元旦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讨论汪精卫叛国一事。最后以汪精卫犯有“匿迹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谬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等罪，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

无奈汪精卫卖国主意已定，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蒋介石见劝说无效后，考虑到汪精卫地位太高，他出面组织叛国政府直接威胁重庆政府；掌握的机密过多，叛国对中国的抗战将会造成极大危害。无奈之下，只得使出最后一招进行暗杀。

执行暗杀任务的是军统，军统局实际负责人、副局长戴笠还亲自跑到河内察看地形。经戴笠亲自安排，由陈恭澍、岑家焯、余乐醒等十多名军统人员前往河内，已经对高朗街27号附近的交通、地形和汪精卫的起居、活动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3月19日戴笠下达了执行的命令。躲在河内的汪精卫，凭他与法国当局的良好关系，一直处在法国殖民机构的保护之下，林柏生案更使他胆战心惊，但他无法躲过正义的惩罚。